

晚商政體形態的研究 ——空間模型的考察

黃銘崇*

本文討論近代學者所建構的商代政治地理空間模型，這些模型包括：(1)傳統模型——方格中的方格、(2)方國聯盟與城邦模型、(3)邑制國家與洞洞乳酪模型、(4)空間考古理論模型、(5)綜合論述模型。這些不同的模型，有其各自出現與發展的學術脈絡及其問題。從近年出現的晚商考古材料看來，這些模型的內涵與考古出土的現象有或多或少的出入，近年出土考古材料之豐富，實足以讓我們使用複雜的綜合論述模型來討論，但是過去的研究或者過於簡略、材料過時，或僅能利用西文二手材料，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未來仍有很大的開展空間。

關鍵詞：晚商、方格中的方格、方國聯盟、城邦、邑制國家、洞洞乳酪模型、空間考古理論模型、綜合論述模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晚商(ca. 1300-1050 BCE)是中國歷史上考古出土的遺址最早能夠與傳世文獻記載相對應的王朝，¹究竟它的政體形態如何，乃是一個現代的問題。對於古代學者而言，先秦王朝的模式基本上是相同的，有「王畿」、「五服」、²或「九服」層層方格相套的空間佈局，³每往外一層與王朝的關係就更疏遠。王畿之內有種種官僚，分門別類，層層相屬(見《周禮》)。王畿之外則有諸侯，公、侯、伯、子、男爵位大小相次，各有其封疆、人民。在服以外的四方則有蠻、夷、戎、狄，乃化外之民。這是從已經高度理想化的西周王朝去理解晚商王朝，其實，晚商王朝不是這個樣子，即便是西周王朝與此一理想化的模型恐怕都有很大的出入。⁴

1 本文焦點為晚商時期，除非必要，筆者會盡避免牽涉到晚商之前的「中商」文化(ca.1400-1300 BCE)、二里岡文化(ca.1600-1400 BCE)與二里頭文化(ca. 2000-1600 BCE)。

2 《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參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頁4。《逸周書·王會解》：「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于內者。」見四部備要本《逸周書》，卷七，頁一。比服者賓服也。《尚書·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見屈萬里，《尚書釋義》，頁71-72。

3 《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見孫詒讓，《周禮正義》，頁2684。

4 關於西周政體的形式，李峰認為當稱為「權力代理的親族邑制國家(delegate kin-ordered settlement state)」，讀者可以參考。Feng Li, "Reconceptualizing

當中國進入了現代的世界體系，無可避免的，中國史必須放在世界史比較的框架下檢視，同時古代文獻的出土(甲骨文、金文)與現代考古學的興起，使得研究此一問題有全新的資料，各種不同的角度與視野遂起。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討論現代學者對於晚商時期政體形態的研究，以下筆者將相關研究區分為：(1)傳統模型——方格中的方格、(2)方國聯盟與城邦模型、(3)邑制國家與洞洞乳酪(*gruyère*)模型、(4)空間考古理論模型、(5)綜合論述模型，分別討論，這些研究模型大體上具有空間性。有些討論雖然與政體形態有關，比方說討論商代是否為「神權政治」，因為未牽涉政體的空間性，本文將割捨不論。

另外，過去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相關討論，因為根據的材料比較老舊，而最終得勢的一方係根據馬克斯主義的社會演化論，亦不納入本文的討論。因為在此一演化論的框架下(原始氏族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學者研究的目的不是在瞭解古代社會，而是在為此一框架增加更多的史料，或替馬克斯等人的論點做註腳，史料透過特定有色眼鏡的解釋與剪裁，當然可以擠入此一框架，但是學術性與他們所強調的「科學性」就必須大打折扣。⁵本文的討論也放棄一些只根據傳世文獻所作的研究，因為傳世文獻在現代的晚商歷史研究中股份太小，不根據出土文獻、考古材料及跨文明的比較與理論模型的建構，上古史夠研究的範圍相當有限，意義不大。

由於商代政體的討論牽涉到全世界早期文明政體的比較，這方面的討論也相當多，筆者建議閱讀亞當·T·史密斯(Adam T. Smith)的 *The*

the Western Zhou State: Reflections on Previous Theories and Models,” pp. 271-299.

⁵ 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對於此類研究，杜正勝稱之為「編輯」；相關批判參見杜正勝，《周代城邦》，頁 1-19。

Political Landscape: Constellations of Authority in Early Complex Polities 一書。此書的第 1 章〈理想化的空間〉(sublimated spaces)與第 2 章〈政治權威的考古〉(archaeologi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將西方相關研究分門別類，並提出他個人的批判。⁶關於中國古代城邦的研究，黃俊傑的〈古代希臘城邦研究的主要趨勢及其方法學上的問題〉檢討了 1977 年以前的相關研究，由於他的討論相當完整與細緻，因此在這部份筆者也會相對簡化。⁷劉莉與陳星燦在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書中，討論了城邦、分立國家(segmentary states)、領域國家(即領土國家)、與村落國家(鄉村國家)等模型；⁸李峰在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 一書也檢視了城邦、feudal state、⁹領土國家、分立國家、邑制國家等模型。以上兩書所討論到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閱，本文也盡量簡略。¹⁰

6 Adam T. Smith,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Constellations of Authority in Early Complex Polities*, pp. 30-111. 此書的長處是作者往往將一種理論自其根源討論起，而非僅討論考古學界的研究，值得一讀。

7 黃俊傑，〈古代希臘城邦研究的主要趨勢及其方法上的問題——兼論古代中國與希臘城邦比較研究的若干方向〉，頁 1-80。

8 源於馬克斯主義的概念——所謂「亞細亞(村落國家)生產方式」，Maisels 提出東亞早期國家的一般模式為「村落國家」，以與美索布達米亞的城市國家對比，所謂村落國家是一個貴族的、行政的與祭祀中心，控制十分廣大的領域(有別於城邦的「腹地」)，領域內都是性質、產物類似的、自給自足的小村落。國家以納貢、抽稅或服勞役的方式對這些小村落抽取捐稅。所謂「都會中心」通常蔓延在相當大的區域，但是建築遺跡卻相當少，並不具有城邦的核聚的現象。貴族的社會組織方式為圓錐狀親屬系統(conical kinship system)。參見 Charles Keith Maisels,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Agriculture*, pp. 12-13; 254-261.

9 由於李峰對於 feudal state 的討論比較詳細，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封建」被翻譯成 feudal 是有問題的。

10 Feng Li, "Reconceptualizing the Western Zhou State: Reflections on Previous

最後，本文的討論會牽涉到一些討論早期政體形態的專有名詞，為了簡化行文，大體在一個名詞首次出現時，在附註中加以界定，正文不再敘述。本文在各節先就個別模型討論，最後再綜合討論。

一、傳統模型——方格中之方格

傳統的方格中之方格層層相套的模型之所以仍然為現代學者所青睞，主要是因為傳世與出土文獻記載顯示，西周早期追溯商代的政治空間領域中有「內服」與「外服」的區別。根據《尚書·酒誥》描述商代：「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¹¹以及西周早期的《大盂鼎》(02837)銘文云：「我聞殷墜令，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喪師。」¹²加以甲骨文中出現了商、大邑商、中商、四土、四方、四奠、鄙、侯、田等名詞，學者就針對這些名詞做了一些推測：陳夢家認為商代的政治區域可以區分為三層，內層為商或大邑、中層包括奠與四土或四方、外層則包括四戈與四方或多方、邦方。¹³王貴民則認為在大邑商之外，四奠、四土、四方分別是商王朝由內往外的不同方格層次，「中商」即四奠，其內有田、衛、子等封爵，在四土中則有侯、伯、子、

Theories and Models.”

¹¹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62。

¹² 本文引用殷周金文資料皆出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其他四所大學共同建構的「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器名後括號中的五位英文字母與阿拉伯數字為該資料庫殷周青銅器的編碼，資料庫網址為：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est/bronze/qry_bronze.php。以下皆同。網頁擷取日期：民國100年9月9日。

¹³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325。

田、任、衛等諸侯。¹⁴宋鎮豪認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構為三層連續的方形，中央為王邑，也就是商王的都城，內層為王畿，是所謂內服，又有郊、鄙、奠三層。中層為四土，是為牧，邊緣有邊侯，是所謂外服。外層為四至，為邦方之所在。¹⁵林歡的模型與宋鎮豪大同小異，差別只是在王邑是否為大邑商，以及在哪一個層次放置甲骨文中所見的侯、牧、田、奠、戊、師等帶有領域特性的官名，以及郊、鄙等帶有空間性質的名詞。¹⁶也有學者認為王畿之內有鄙、單、奠、戈等名稱，¹⁷或藉著這些名稱來討論行政區劃的問題。¹⁸此種模型也影響到考古學的研究，如宋新潮將商代的政治疆域區分為商文化中心區、商文化分布區以及商文化影響區三個形狀不規則的圈圈，對應的就是王畿、商代政治疆域以及周邊地區的方國。¹⁹

傳統模型或「方格中之方格」模型之所以各家看法各異，主要是這些空間彼此的關係必須有內部證據(*intrinsic evidence*)方能確定。比方說如果一片甲骨版中同時出現四方與四奠，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有內部證據可以討論。但是目前顯然沒有這麼好的材料，那麼就必須憑其他相關的證據來討論，例如，西周早期因為周人並不具有統治的觀念與技術，因此在國土觀念與統治方法上幾乎全盤抄襲晚商，是以西周早期相關的觀念就可以作為晚商的參考。不過，即使利用西周早期

14 王貴民，〈商周政權結構〉，《商周制度考信》，頁 95-169。

15 宋鎮豪，〈論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構〉，頁 6-27。宋鎮豪，〈商代的王畿、四土與四至〉，頁 48、55-59。

16 林歡，〈晚商地理論綱〉。

17 連劭名，〈殷墟卜辭所見商代的王畿〉，頁 38-66。

18 蕭良瓊，〈商代的都邑邦鄙〉，頁 337-349；李雪山，〈商後期王畿行政區劃研究〉，頁 99-105；王震中，〈商代的王畿與四土〉，頁 1-13。

19 宋新潮，〈殷商文化區域研究〉，頁 201。

的材料，欲建構一個完美的層層相套的方格，仍是文獻不足。然而，此一模型還是不宜全盤否定，畢竟它還是有傳世與出土文獻的加持。

「方格中之方格」模型並非實際的政治地理分布，此種模型顯然是一種「圖解式模型(schematic model)」，但是商代政治地理的圖解式模型真是方格中之方格嗎？艾蘭認為商代的中商與四方應當是一個正方形四邊各連接一個正方形，也就是形成「亞字形」的宇宙。²⁰有些學者認為，此種亞字形的宇宙形狀被用來建造墓葬，並保留於後代象徵宇宙的明堂之中。²¹筆者認為此種亞形的宇宙形式，才是商人對於政治空間圖解式模型的空間形式，最主要是因為商人認為自己所居是宇宙的中心，所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並非虛言。²²根據文獻所載，商或商邑經常與四方對舉，例如：《尚書·立政》：「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²³《屯南》(1126)：「商。東方、北方、西方、南方。」²⁴宇宙的形式是中間的商與四方構成的亞字形，那麼，這中心以外的四個方塊或四方究竟屬於商或非商？

首先，甲骨中「X方」經常是用來描述與商敵對的政體，²⁵他們的首領稱被為「X方(Y)伯Z」，如夷方雖伯某，其中X為商人所認定的大團體，Y為大團體中的次級政體，Z則為該團體首領的私名。這與商王朝系統的武職的「侯」不相同，方經常是被征伐的對象，伯則

20 Sarah Allan,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21 張光直，〈說殷代的「亞形」〉，頁 81-86。黃銘崇，〈明堂與中國上古之宇宙觀〉，頁 134-195。

22 《詩經·商頌·殷武》，見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628。

23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 224。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小屯南地甲骨〉，括號中的編碼為該書中甲骨編號。

25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

常見被俘虜以後，人頭落地，甚至被刻上文字以示懲戒，或用於祭祀，這些都未見發生在侯的身上。看來「方」應當是指非商的地域。其次，西周早期的《令方彝》銘文提供了一些證據：「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明公朝自于成周，佻令：舍三事令，眾卿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²⁶周公子明保作為西周早期成周地區最高的執政者(相當於美國的國務卿)，他所管轄的包括三事與四方兩個範疇，三事為內政，是西周王朝權力之所及；其相關官署包括卿事寮、諸尹、里君、百工與諸侯，諸侯則包括侯、甸、男，也就是三事的範疇包含了內服與外服。四方的範疇在此一銘文中並未界定，但是在《逸周書·王會解》的篇末附有篇《伊尹朝獻商書》稱為「四方令」，其中四方所包括的全都是遠方異國，²⁷而不是商系統的諸侯，可以為旁證。所以，「四方」指的是連接在商王朝這個理想上是方形的空間四邊的四個方形空間，而且它們屬於「非商」的。

至於四土、四奠的具體位置，首先，所謂四奠之中有些為殘辭拼湊，所以裘錫圭不認為有整齊劃一的東、西、南、北四奠。他認為奠有處置的意思，「奠」作為動詞，是商王將被商人戰敗的國族或其他臣服國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他所控制的地區內。此種人被稱為奠，奠置他們的地方也稱為奠。奠也不是特定的區域或範圍，而是分散在不同地區。裘錫圭並不認為「奠」與「田」是相同的，²⁸而甲骨

²⁶ 參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器號 09901。

²⁷ 《逸周書·王會解》：「《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逸周書》，卷 7，頁 11b-12b。

²⁸ 裘錫圭，〈說殷墟卜辭中的「奠」——討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頁 659-686；連劭名，〈殷墟卜辭中的成和奠〉，頁 1-6。

文與金文中的「某田」應當就是指「某甸」，是一種分封的產物，與「某侯」類似，但性質又不相同。從名稱的本意上看，「侯」可能主要與軍事相關，「田」則不具軍事特性，且兩者之間並不存在階級的關係(例如侯高於田或相反)。至於四土，在甲骨文中亦與商並舉，並且在一起受年的記載：²⁹東土有被商貴族征伐的紀錄，³⁰西土有被侵擾的紀錄，³¹南土在一系列占卜中，與南封方相連繫。³²這些記載說明四土大體上是商的領域，但可能距離王都較遠，所以有時會被侵擾，甚至會被佔領，也與四方相鄰。

所以，晚商王朝對於政治地理的圖解式模型大體如下：正中央為王邑，³³其四邊有屬於商控制的領域是一個大方框，其中分布著貴族居住的族邑，族邑的外圍稱為「鄙」，鄙內通常有相當多眾人所居住的小聚落——「邑」。³⁴注意此處的「某族」指的不是人類學上的親屬，而是以某為族徽的貴族的親族，及他們所統屬的眾人所構成的部隊。族邑與鄙和其中邑的土地可能是商王指派的，所以與西周的封建類似。值得注意的是從考古資料上觀察，族邑與一般邑的差別並非大小，而是是否帶有青銅禮器，帶有族徽的貴族居住。有些在較邊遠地區的貴族，被賦予「侯」的身分，另外有一些則被賦予「田」的身分(圖二)，在此一方塊的邊緣被稱為四土，四土以外各有一個方塊即四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甲骨版編號 36975。以下引用甲骨文簡稱《合集》36975。

30 《合集》3708。

31 《合集》6357。

32 《合集》20576。

33 李學勤等編，《英國所藏甲骨集》，甲骨版編號 344。

34 楊升南，〈殷墟甲骨文中的邑和族〉，頁 152-166；宋鎮豪，〈商代的邑制所反應的社會性質〉，頁 57-65。宋鎮豪，〈商代「邑」區劃形態考察〉；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結構與商王的統治方式〉，頁 184-208。

方，在四方之中，是非商系統的「方」，有時受商的冊封稱為「封方」。商王之所以關心四方之受年，是因為商自認為四方之極，占卜四方是否受年，顯示出商王自認為是他所屬的世界的最高統治者。

以上模型有其侷限性，主要是因為它並非根據一項當時的圖解式模型材料的解讀，而是根據不同材料拼湊所得。其次，這種圖解式的模型並非考量真實的自然地理後的政治地理，兩者的差異在於真實的政治地理邊界是會移動的。例如晚商在東方的山東地區是向前推進的，但是在西邊可能由於周方的擴張而不斷地退縮中。而且，屬於商的中間方塊，聚落也不是平均地分布。當時的聚落，大多數都沿河川分布，土地的開發也因為尚未使用鐵製工具而有很大侷限，在商王朝能夠掌控的範圍中，還有許多土地是未開發的森林沼澤地帶。

二、方國聯盟與城邦模型

王國維最早突破古代方格中之方格的框架，認為商王為諸侯之長而非諸侯之君，³⁵當然也意味著其他所謂諸侯，其實是與商同時存在的同儕政體，也當然有一定的獨立性。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一書提出商周時代為城市國家，不過他的目的並不是在瞭解商周時期「城市國家」的內涵，而是以「城市國家」來打擊「封建制度」，目的是證明西周時代是奴隸社會，而商代晚期則是奴隸社會初期階段。他所謂城市國家的內涵，強調的是城市與農村的對立。³⁶

林滄提出商代為「方國聯盟」的理論，企圖反駁當時許多學者根據傳統的朝代承襲以為自黃帝以來就是「大一統」，認定商與後代一

35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頁 451-480。

36 侯外廬，〈中國古代「城市國家」的起源及其發展〉，頁 143-205。

樣為一集權國家，即所謂「東方專制大國」的看法。林澐的論點是根據于省吾對於商代社會的看法加以引伸，于省吾認為商代是原始氏族社會的後期，即父權制的發展期，也是軍事民主主義時期，其政治組織為「部落聯盟」。³⁷林澐將于省吾的「部落聯盟」升級為「方國聯盟」，與當時主流的「帝國」的看法抗衡。他所謂「方國」是以湖北黃陂盤龍城為其典型，具有夯土城牆，城內有宮殿，城外有作坊和居住區，並且控制一定範圍的領土。「方國聯盟」是指商王朝與某一或某些方國為了對付共同敵人所結成的「軍事聯盟」。他利用甲骨文中的動詞「比」（有許多學者仍讀為「从」），意為「同等而結黨」，來判斷商王朝與方國的聯盟共同征伐。根據他的分析，這類與商王朝同盟共同進行軍事征伐的方國如興、鬼、而、井、易、丹、犬、攸、望、奚、暴、沚等，他們與商王朝的關係是對等的，與商王朝的關係，也未必是平和的，往往是經過雙方的鬥爭之後，才參與聯盟的行動。

林澐認為商王之稱「王」而其他方國首領稱「侯」、「伯」、「任」等，同時商王命令這些方國或方國首領時也用「呼」、「令」等動詞，顯示商王是聯盟的盟主。商以及中原一帶的「方」，已經進入階級社會，並且有官吏、監獄、與常備軍等國家機器，所以甲骨文所反映的以商為核心的方國聯盟，其實質是城邦國家聯盟。他以為商王朝的地域應該與《史記·吳起列傳》中吳起所說符合：「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³⁸其本土並不太大，³⁹而維繫

³⁷ 于省吾，〈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社會性質〉，頁 97-136。

³⁸ 《史記》，頁 2166-2167。

³⁹ 《史記》所列四至，筆者認為孟門為武陟之孟門，係商代黃河東北流的起點，常山在正定一帶，以孟門、太行、常山、大河為四至所包圍的範圍約 25,000 平方公里，以古代文明而言，25,000 平方公里的面積已經相當大。關於商代的國的範圍有另一種說法是《戰國策·魏策》：「殷紂之國，左

王朝的關鍵，在於維持一個穩定的方國聯盟。⁴⁰這與王國維的諸侯之長的概念相仿。

林澐的「方國聯盟」說雖獲得張亞初、晁福林等學者的支持，⁴¹但是楊升南、王貴民以及晚近徐義華等，根據同樣的甲骨文材料進行了有系統的解構。首先是王與所謂「方國」有關的動詞往往是「令」、「呼」、「取」。楊升南認為，商王與方國之間存在著上下級的從屬關係，特別是動詞「令」具有高度的權威性，使用「令」這個動詞的僅有在上界的「帝」，與在人世的「王」和「子」(在子卜辭)。王在諸侯國的領土內有自由行動的權力，在諸侯國內進行祭祀與占卜，代替諸侯國處理事務，懲罰未服王命的諸侯，是所有土地的名義上的擁有者，調集諸侯軍隊出征。諸侯有到王朝服役，擔任貞人的任務，有向王朝納貢，為王朝戍守邊疆，提供王朝人員與軍隊食宿，隨王朝出征等責任。楊升南認為：「商代的諸侯有一定的地域(領域)，有軍隊，也有自己的官吏系統，是個帶有一定獨立性的政治實體。……諸侯政權對商王是臣屬關係，在實質上，就是後世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一種初期狀態。」王貴民則利用相同材料，但強調商代國家的「統一性」以及商王權的「專制性」。徐義華的結論則又將商王朝的性質擺向「集權國家」一方。⁴²

在日本方面，宮崎市定接受西方學術界社會演化論者的看法，認

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背山。」《戰國策》，頁 782。

⁴⁰ 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頁 67-92。

⁴¹ 張亞初、晁福林對於商代方國的概念與林澐相同，見張亞初，〈殷墟都城與山西方國考略〉，頁 388-404；晁福林，〈從方國聯盟的發展看殷都屢遷的原因〉，頁 65-73。

⁴² 楊升南，〈卜辭中所見諸侯與商王室的臣屬關係〉，頁 15-52；王貴民，〈商周政權結構〉，頁 95-169。徐義華，〈商代國家性質申論〉，頁 8-17。

為世界各地的古代史均為單線的演化，其途徑為「氏族制度→都市國家→領土國家→大帝國」。⁴³他認為中國自殷末至春秋為都市國家，戰國時代為領土國家，秦漢時代為大帝國。⁴⁴貝塚茂樹的體系以及演化的時間表，基本上與宮崎市定相同，對於殷代國家的性質，他一方面認為殷代有領土國家的性格，但與希臘羅馬都市國家的特質比較，仍大體而言可歸為都市國家。⁴⁵也就是說，儘管從材料分析不盡相符，但貝塚茂樹仍將商代訂為都市國家，最主要的因素是他相信社會演化論，而春秋時代具有強烈的都市國家色彩，那麼在春秋以前的西周與

43 日本所謂都市國家，即西文 city-state 的翻譯，中譯尚有城市國家(中)與城邦(臺)等，在考古學上：「城邦」是一種特定的聚落模式，一般而言，我們理解的城邦(複數)是小的、領域性的、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系統(複數)，以一個城市或城鎮為首都，帶領著周圍在經濟上與社會上具有完整性的周邊地區。整個單元，城市以及其周邊地區在經濟上是相對地自給自足，並且被認為與周遭的城邦系統(複數)在種族劃分上可以明確地區別。」Charlton, Thomas H. and Deborah L. Nichols, "The City-State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pp. 1-14. 一般而言，城邦不僅是一個空間系統，還包含一些重要的政治、社會內含。希臘城邦或蘇美城邦則不僅本身具有完整主權，周圍存在著同儕政體(其他城邦)形成一個城邦系統，最重要的基礎是市民的參政權，與服兵役的義務。參見黃俊傑，〈古代希臘城邦研究的主要趨勢及其方法上的問題——兼論古代中國與希臘城邦比較研究的若干方向〉，頁 1-80。Elizabeth Stone, "City-States and Their Centers: the Mesopotamian Examples," pp. 91-106. David Small, "City-States Dynamics through a Greek Lens," pp. 107-118.

44 宮崎市定，〈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頁 187-200；〈中國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國家か〉，頁 1-20。關於宮崎市定的討論詳見黃俊傑，〈古代希臘城邦研究的主要趨勢及其方法上的問題——兼論古代中國與希臘城邦比較研究的若干方向〉，頁 23-27。

45 貝塚茂樹，〈中國古代都市國家の性格〉，頁 162-167；《中國の古代國家》，頁 49-100。

商代就非得是都市國家不可了。⁴⁶社會演化論的影響以及套用理論的問題不言而喻。

杜正勝認為商代到春秋時期的城牆城市為「城邦」，在《周代城邦》一書中描繪周代(特別是春秋)為一「城邦時代」；此一描繪無疑是成功的，其論述重點是居住在城中的平民(國人)參與政治。⁴⁷後來在〈卜辭中所見城邦形態〉一文中，他進一步認為商代的封國也是城邦，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城邦(國)範圍大約是百里(約30公里)左右，中心是築有城牆的邑，周圍郊、甸(奠)、鄙、野分布著農莊聚落，有圍牆者也稱為「邑」，無圍牆者稱為「田」，外圍有封疆。在考古出土材料上，他以盤龍城為代表，卜辭記錄則以擔任先鋒從帝辛征人方的攸侯之國為代表。這些城邦雖然自視為獨立的政治實體，未必隨時與商王朝的關係良好，但是一旦遇到強敵，仍須求助於最大的城邦商王朝，所以也受命於商王朝，並且在共同作戰上擔任重要的任務。⁴⁸杜正勝所論商代城邦的重點是其內政上的獨立性，他認為以「封建城邦」的概念來理解商代政體，可以消弭方國聯盟與集權制度兩種看法之差異。

西方學者對於商的城邑與國家形態也同樣以跨文明間的比較為其基調，早年衛特里(Paul Wheatley)根據中研院史語所在殷墟的發掘，發現殷墟缺乏類似西亞、埃及等地的巨大紀念性建築，根據當時的考古資料，他所想像復原的殷墟像一個村落。然而，傳世文獻中的商代都城卻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顯示商王朝自認為是宇宙中心，衛

46 貝塚茂樹所相信的話演化論不僅是政體的演化，還包括從遊牧到定居的演化，參見氏著，《中國の古代國家》，頁162-176。

47 杜正勝的《周代城邦》指出，西周與春秋的國人參政，在中國的先秦時代並非常態，而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簡而言之，與西周早期周王朝武裝殖民時的成員構成有密切的關係。

48 杜正勝，〈卜辭中所見的城邦形態〉，頁12-34。

特里遂認為中國早期都城的性質是宇宙中心，主要的功能為宗教祭祀，經濟與政治功能相對地不重要。⁴⁹

葉山(Robin Yates)以杜正勝的城邦分析為基礎，加上衛特里的影響，進一步分析傳世文獻與甲骨文中的邑、國、野等概念，認為商代的國家是所謂「城邦」，親屬關係是每一個城邦社會結構的基礎，因此祖先祭祀是維繫政治體制最重要的力量。他整合杜正勝與衛特里的看法，進一步認為的商代的國家形態類似曇百雅(S. J. Tambiah)在討論東南亞國家時所用的「星系政體」(galactic polity)，⁵⁰此一政體是以城邦一商為中心，圍繞著許多其他的城邦，形成一個彼此相關的系統。在此種系統中，法律不是維繫國家的關鍵，宗教儀式在政治過程以及聚落

49 衛特里認為東亞與東南亞古代都市的特質在宗教而不在人口多寡，他認為世界早期都市文明包括商代的都邑既非依賴商業關係或市集而形成聚落，也不是建立在城砦或防衛性堡壘的都會，而是一個宗教祭祀中心。這可能是葉山會引用曇百雅的星系政體說(詳下註)的重要原因。Paul Wheatley, *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p. 225.此一說法得到不少學者的贊成，最著者如吉德煒，參見 David N. Keightl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Urbanism," pp. 527-538. Vandermeersch 曾經提出不同的意見，他以為中國宗教基本上為祖先崇拜，本質上為種家族的祭祀，其本身無法成為都市中心。中國的宗教與都市之起源並無關連。中國城市基本上是一種宮殿城市，而非宗教城市。參見 Vandermeersch, L. "Review of *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pp. 254-262. 因為他的反對，吉德煒又寫了一篇文章重申他的意見，參見 David N. Keightley, "The Origi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A Comment," pp. 63-65.

50 曇百雅所謂「星系政體說」是根據印度——西藏傳統概念的 *mandala*，每一個 *mandala* 都是又一個中心，稱為 *manda*，以及一個稱為 *la* 的包覆體所構成。*Mandala* 的設計是由許多的衛星圍繞在中心。他認為，東南亞的王國(複數)所形成的體系，就是以 *mandala* 的概念去安排政治地理空間。Tambiah, Stanley Jeyaraja,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pp. 252-286.

層級的形塑上扮演關鍵的角色。⁵¹

亞斐(Norman Yoffee)則再引用吉德煒以及葉山的論點，認為二里頭、鄭州以及殷墟都是城邦。他認為，商與同時存在的許多城邦(例如，鄭州與偃師商城可能各為一城邦)一起競爭，商王必須帶領軍隊，到處田獵，以維持他在商城邦體系中的地位。⁵²

三、邑制國家與洞洞乳酪模型

「邑制國家」是由松丸道雄所提出的，他的說法必須放回到日本學術界的脈絡下來看。松丸道雄企圖跳脫宮崎市定、貝塚茂樹等學者的社會演化理論框架，直接根據甲骨文與金文內容進行分析。他關於商代國家的內涵，是建立在一篇關於殷代田獵地的論文之上；他分析晚商甲骨文中田獵刻辭，得出商的領土並不大，殷王必須地田獵，以打壓大量存在的異族，鞏固氏族的疆域，所以田獵與殷代國家的建構有密切的關係。⁵³松丸又進一步指出，在甲骨文中一般眾人集居的小聚落被稱為邑，有圍牆包圍，數量眾多。王所居的大聚落稱為「大邑」，殷代可以安陽殷墟為代表。從屬於王的氏族領袖，與王族形成虛擬的

⁵¹ Robin Yates, "The City-State in Ancient China," pp. 71-90.

⁵² Norman Yoffee,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pp. 50-51. 由於 Norman Yoffee 無法閱讀第一手的出土文獻以及考古材料，他根據二手材料引伸的解釋與看法，卻超過吉德煒等人原來閱讀甲骨文總結出的觀點。嚴格而言，與他自己在書中所批評的「factoids」並無太大差別：「Factoid 是經常被提出的推想或猜測，由於經常的出現，以致於最終被視為證據確鑿的事實(hard fact)。」Norman Yoffee,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p. 4.

⁵³ 松丸道雄，〈殷墟卜辭中の田獵地について——殷代國家構造研究のために〉，頁 1-163。

親屬關係，居住於族邑，尊從王命參加征討居室活動，參與王室的祭祀與占卜，納貢龜甲、卜骨等等。王也關心他們住地的農業收成，田獵行旅通過這些氏族駐地。據此，松丸道雄將商貴族族氏的住地稱為「族邑」，並以在不同文章中分別以考古發掘的河南焦作古城和湖北黃陂盤龍城來代表族邑之形式。一般眾人的居邑則稱為屬邑。三者形成了大邑——族邑——屬邑的層級關係。

不過，在當時中原地區雖然存在著服屬於王的族氏，但是也有許多不服屬於商王的異族，例如土方、舌方等。他認為這些殷王室禮制節度之外的異族，並不是居住在遙遠的地方，而是與服屬於王的氏族在中原地區混住。而且由於當時工具的限制，開闢土地以及灌溉系統的力量都相當有限，因此還有許多地方是未開發的土地，有些是森林、沼澤，有些則是田獵地。所以，商王朝基本上就是王邑、族邑、屬邑所構成的點，以及連繫這些點間的路線。後來他又受到張光直介紹的西方新演化論：從游團→部落→酋邦→國家的影響，並考慮考古出土不同等級聚落與它的邑制國家間的對應，在族邑中又因其尺度區分為：大邑(王城，數百公頃)——大族邑(數十公頃)——小族邑(數公頃)——屬邑四層；不過也指出這是根據理論所作的復原，目前甲骨文、金文中並無大、小族邑之相關資料。⁵⁴

松丸道雄的「邑制國家」，無異就是吉德煒「乳酪模型」的基本內容。吉德煒專從甲骨文的内容來看商代國家，他將甲骨文的内容分為 39 類，分門別類地考察商王朝的主權(sovereignty)、領域性(territoriality)、宗教與親屬、盟邦與戰爭、交換(exchange，包括貿易[trade])與貢賦(tribute)等問題。也就是根據社會科學所謂「國家」的定義，列出國家的條件，

54 松丸道雄，〈殷周國家の構造〉，頁 49-100、〈殷の國家〉，頁 57-66、〈殷周春秋史總說〉，頁 3-26。

再將甲骨文內容分門別類地考慮分析，這是他在商代國家政體研究上最為巨大的貢獻。他主張商王朝為「初期的國家結構(rudimentary state structure)」，或「初級的國家或王朝(incipient state or dynasty)」，⁵⁵抑或「初期王朝國家」(incipient dynastic state)，⁵⁶認為商王朝的領域並非像豆腐一樣地密實，而是如同一個「洞洞乳酪」，也就是在商王朝的領域中間還可填入很多非商的國家，商王必須不斷地透過田獵的方式，凝聚鄰近地區對商王朝的認可，這就是著名的「洞洞乳酪模型」。商王朝所能夠控制的只是一些重要的路線網絡以及城堡；其官僚體制的成份極小，親屬與宗教對於商王朝的凝聚具有關鍵性的地位，亦即商代的宗教、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⁵⁷

吉德煒又認為，他所認識的晚商政體，符合人類學所謂分立國家(segmentary state)模型，他引述：「『分立國家』是指一個國家的禮儀宗主權與政治統治權兩個領域不相重合，前者擴大到一個伸縮的、隨時改變的大範圍，但是後者卻僅限於中央核心領域。亦即主權雖然被承認，但是為有限的與相對的，形成一系列的區域，在中心為絕對地，距離中心愈遠的周邊地區權威愈弱，且經常變為只有儀式性的盟主權或宗主權。雖然有一個中央政府，但同時存在周邊的行政中心，中央對於周邊行政中心僅具有很小的控制。」⁵⁸

55 David N. Keightley, "The Late Shang State: Where, When and What," pp. 523-564;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p. 25-34.

56 David N. Keightley,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ca. 1200-1045 B.C.)*, p. 56.

57 David N. Keightley,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 26; "The Late Shang State: Where, When and What;" "The Religious Commitment: Shang The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pp. 211-225.

58 Aidan William Southall, *Alur Society: A Study in Processes and Types of Domination*, p. 248; "The Segmentary State in Africa and Asia," pp. 52-82.

松丸道雄與吉德煒對於甲骨文的研究有系統且觀點比較全面，分析也相當縝密，不過他們的研究幾乎完全倚賴甲骨文字的解讀與分析，很少利用到考古、金文與美術方面的材料，也未考慮自然地理、氣候因素的影響。完全從甲骨文分析有其盲點，例如關於田獵地點所得到的地理空間，往往必須與後代傳世文獻的地名對應，不同學者對應的出入相當大，甚至同一學者在不同時期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差異。劉莉與陳星燦曾經指出，不少學者根據傳世文獻與甲骨文討論山西南部的方國，但是根據考古調查，此一地區在晚商時代沒有考古遺址，可見此種單憑甲骨文的討論有其侷限性。⁵⁹松丸道雄認為田獵地點大體在殷墟附近，但是多數的學者的看法都與他相左。⁶⁰

以上，不論是城邦、方國聯盟、邑制國家或乳酪模型，無非是強調存在的同儕政體各自獨立，尺度接近，彼此競爭。然而首先從聚落尺度觀察，近年考古資料愈來愈清楚地顯示，殷墟與華北平原其他同時存在的聚落間，從尺度上看是不對等的。最新資料顯示殷墟遺址的總面積為 3,600 萬平方公尺(即 3,600 公頃)，盤龍城在前述學者撰寫論文的時代，僅發現 7.5 萬平方公尺的內城，面積僅為殷墟的 1 / 480。即

59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p. 24.

60 董作賓的《殷曆譜》有一部份研究是關於地理的，特別是晚商王朝幾次征伐的甲骨記載，是日期相連，可以根據每日的路程，大致推算距離。參見董作賓，《殷曆譜》。鍾柏生改良董作賓的方法並也做了更有系統的研究，參見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記事刻辭中的殷代地名〉，頁 61-129；〈卜辭所見畋牧地名〉，頁 163-184。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的方國地理一章，對於殷代地理也有討論。李學勤針對陳夢家的討論有所評論，參見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近作如鄭杰祥，《殷代地理概論》；陳煒湛，《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林歡，〈晚商地理論綱〉。筆者認為鍾柏生的說法在方法學上，前後一致，臆測的成份少，最為可信。但是與松丸的看法差異極大。

使以後來發現的外城計算，其面積也僅及殷墟的 $1/72$ 。與殷墟同時的所謂「區域核心聚落」，如濟南大辛莊僅有 30 萬平方公尺，面積為殷墟的 $1/120$ 。被認為係非商方國都城的清澗李家崖古城僅 6.7 萬平方公尺，⁶¹面積不到殷墟的 $1/500$ 。假設人口、軍力、經濟力與聚落面積成正比，那麼像盤龍城、大辛莊那樣大小的聚落與殷墟的關係，絕非斯巴達與雅典的關係，也就不是一個城邦對另一個城邦的關係。陝西清澗李家崖古城遺址由於尺度較小，且附近地區出土的器物多是北方系青銅器，此種青銅器與北方草原族群有關，因此也不宜視為農業的城邦，而必須以另外的角度思考它的性質。

其次，從象徵性資本(象徵財，symbolic capital)來看，安陽雖然缺乏像美索布達米亞或埃及的紀念性建築，但是誠如巫鴻所指出的，中國古代的紀念性概念與西方不同，主要可能是依賴銅器而非建築來表現與傳達。在青銅器的消費上，安陽晚商墓葬規模超過婦好墓者至少有 22 座，總共埋藏的青銅器重量，如果以婦好墓的 1.65 公噸為準，光是這些最頂級的消費者墓中的銅器，其重量可能遠超過 35 公噸，青銅器的總件數可能遠超過 4,200 件。規模小於婦好墓的墓葬數量龐大，所出土的青銅器，數量與重量也不小於前述數字。

到目前為止，殷墟是華北平原同時期遺址中，唯一有大規模青銅禮器作坊的地點，其他地方都僅有修補青銅器，製作兵器工具的簡單作坊。華北平原大多數聚落出土的晚商青銅器，風格相當一致，可能都是由安陽製作，再由商王所分封的族氏帶到各地(華北平原之外，三星堆遺址也有類似於殷墟的青銅生產能力，其遺址面積約為安陽的三分之一，可見具有

61 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李家崖古城城址發掘簡報〉，頁 47-56；呂智榮，〈試論陝晉北部黃河兩岸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及有關問題〉，頁 214-225。

規模的銅器生產是建立在具有規模的消費與動員力上)。此種消費力的驚人之處，在於安陽附近並無銅、錫礦，晚商時期的銅、錫，從目前的考古材料看來，可能來自湖北、江西、安徽等地，也就是說商王朝必須利用各種手段，取得大量的銅、錫資源，其政治實力必然是相當驚人的。近年在山東渤海灣的考古也發現，商王朝也直接在此地設立殖民地與保護網，大量生產海鹽，以供應商王朝內部的需求。山東濟南大辛莊以及青州蘇埠屯都是將生產海鹽運送到安陽的路線保護網的成員。

除了各種不對等的現象外，近年考古發現殷墟本身是一個超大聚落，內部包含王族控制的王邑以及各族氏分別控制的族邑，在殷墟以外則有許多族氏分封的地點(即「族邑」)，例如河北定州北莊子(嬰)⁶²、武安趙窑(矢)、河南滎陽小胡(舌)、正陽閭樓(亞禽)、羅山後李(息)、山東滕州前掌大(史)、益都蘇埠屯(亞醜、融)、山西浮山橋北(先)、靈石旌介(囂)、臨汾龐杜(自冊)等。這些地點都出土超過兩座以上的墓葬，而且墓葬中銅器的銘文顯示同一族徽，被祭祀者以日名稱呼(例如父甲、祖乙、子癸等)，而且墓中出土的爵、觚都顯示與殷墟相同的等級制度。這還不包括其他僅出土一座較大墓葬，有商貴族族徽，且顯示同樣爵、觚等級制度與使用日名者，例如，河南溫縣小南張(徙)、山東壽光古城(並)、蒼山東高堯(夔)、濱州蘭家(囂)等地。

這些例子說明，商王朝的分封是以族為單位，這些分封的族氏雖然在外，但是卻都遵守商王朝的等級制度。它們距離安陽殷墟少則 80 公里(趙窑)，最遠者超過 400 公里(蘇埠屯、後李)，都遵守相同的秩序，而且此種秩序顯然是安陽所制定的，且是政治性為主，宗教性為輔的。⁶³在上述地點以內的廣大區域，除了山東地區有明顯的兩種類型

⁶² 括號中為族徽，即駐紮與此地的族氏名。

⁶³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

陶器顯示土著文化並存，絕大多數地區的陶器類型都與安陽相同，青銅器以及其他文化現象也都與殷墟相同。

總而言之，從考古出土的現象看來，到目前為止華北平原尚未出現過一個「非商」的都市，堪稱商王朝的同儕政體。與商有對抗關係的政體，東邊遠在膠東半島，北邊在北京、天津附近，西北在呂梁山脈以西，西邊在渭河流域。城邦或洞洞乳酪模型，從考古資料看來都難以成立。

四、空間考古理論模型

雖然劉莉與陳星燦討論的是二里頭與二里岡時期的政體形態，但他們所使用的方法與相關結論還是值得我們在此一談。他們代表的是以西方考古學的空間分析理論，來研究中國國家形成的一個晚近趨勢。此類研究在西方的考古學界已經行之有年，主要是從經濟地理學借用的「中地理論」，以及「聚落排序——尺度分布曲線(rank-size distribution)」等工具，來考察聚落的分布與尺度上的表現。⁶⁴這些工具原屬於經濟地理學發展出的模型，但是由於經濟與政治無法截然劃分，也逐漸被用來作為政治上演化的指標。聚落的層級愈多，表示愈接近「國家」，聚落排序——尺度曲線在一般是呈 45 度角往下的直線，但是在早期國家往往有「首大」(primate)的現象，也就是最大的城市與

⁶⁴ 「中地理論」與聚落的等級——尺度分布曲線相關理論，參見 Peter E. Lloyd and Peter Dicken, *Location in Space: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 Geography*, pp. 20-66. 一般考古學家是以 K=3 或 K=4，也就是聚落規模有三層或四層的差別，來看一個區域是否已經進入「國家」階段。K=7 則稱為「行政原則」(administrative principle)，這部份是被大家忽略的，商代聚落的模式，可能是根據行政原則。

其他聚落比較起來不成比例地大，所以曲線的上半段有下凹的現象。⁶⁵

劉莉與陳星燦在方法設定上，採取多學科的取向。他們有系統地整理龍山到二里崗時期考古調查與發掘資料，根據聚落等級由龍山時期的 2 或 3 級，發展到二里頭時期的 4 級；以及聚落排序——尺度部曲線從龍山文化期外凸的斜線，發展成二里頭與二里岡時期下凹的「首大」分布線。再加上傳統的指標，例如：二里頭聚落本身的尺度巨大，區域性的陶器風格消失被都會風格取代，大型建築出現，青銅與其他貴重物品的出現，墓葬的階層化傾向等，都顯示這兩個政體在政治與經濟上朝著集中化的方向發展。他們因此認為，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中心的二里頭文化以及以鄭州為中心的早商文化已經進入所謂「國家」的階段，⁶⁶有別於龍山時代的「酋邦」(chiefdom)。⁶⁷

以二里頭為中心的二里頭國家，以及以鄭州商城為中心的早商國家的所在地，基本上是適合農業發展的沖積平原地帶，但是同樣都缺乏銅、錫、鉛以及鹽等自然資源。劉莉與陳星燦認為，二里頭國家以及取而代之的二里岡國家為了取得這些資源，在其邊緣地區建立的一

⁶⁵ Robert McC. Adams and J. Nissen Hans, *The Uruk Countryside: the Natural Settings of Urban Society*. G. A. Johnson, "A Test of the Utility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in Archaeology," pp. 769-785; *Local Exchange and Early State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ern Iran*.

⁶⁶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pp. 29-35.

⁶⁷ 「酋邦」一般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組織的形式，比起部落(tribe)或遊團(band)要複雜，比起國家或文明要來得簡單。根據 Robert Carneiro 的定義：「是一個自治的政治體，由數個村落或社區所構成，由單一的酋長所掌控」。在酋邦這種組織中會有權力的集中以及不平等，一個社會至少分成兩個以上的階級，在貴族階級中會有單一的世系群成為酋長，成為最有地位的貴族。親屬關係是酋邦最種要的組織原則，婚姻、年齡、性別會影響一個人的地位與角色。在經濟關係方面一般的村落或向酋長繳交納貢。」參見 Robert L. Carneiro, "Chiefdom: Precursor of State," pp. 37-75.

些規模小於都城的城或聚落，例如：夏縣東下馮、垣曲商城、濟南大辛莊、西安老牛坡、黃陂盤龍城、清江吳城等，作為攫取當地資源的地區中心。此種次級聚落與城址下還有兩層更小的聚落，構成在經濟或行政上的「四個層級」。在生產方式上，他們認為二里頭與二里岡國家的生產方式可以稱為「貢賦生產方式」(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一方面周邊地區的城將都城所需的資源採集並且將它們納貢到都城；另一方面具有身分象徵意味的身分象徵財在都城製造以後，又帶回到周邊的城或控制聚落內。⁶⁸

整體而言，劉莉與陳星燦的研究對於中國古代考古學貢獻極大，他們將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方法，帶進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當中，也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最新的材料引進西方學術界。有許多結論，例如二里頭與早商已經屬於領域國家，以及二里頭國家與早商國家為掌握重要資源，而在相當遙遠的地點設置有城牆的聚落，以便就地控制資源等，都具有說服力。

儘管筆者接受劉莉與陳星燦的大部份的觀點，但是有一些問題還是必須提出來討論。首先，它們在討論二里頭是否為國家時，利用了河南(主要是豫西)與山西地區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垣曲古城、東下馮、孟莊、焦作古城都涵蓋在其中)，並將這些遺址分為四個等級。雖然這不是建立在完全的系統區域調查基礎上，但是，我們願意接受此一分析，因為此一區域包括了兩個主要的系統調查所涵蓋的範圍，⁶⁹而且過去的兩

⁶⁸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pp. 138-139, fig. 25-26; "Cities and Towns: the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arly States, China," pp. 5-48. Li Liu,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劉莉、陳星燦，〈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頁 45-60。

⁶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洛陽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調查簡報〉，頁 18-37。陳星燦等，〈中國文明腹地的社會複雜化進

次文物普查也有一定的涵蓋率。不過，在討論政治——經濟地景時，將湖北黃陂盤龍城放入了四級聚落的架構，容易讓人誤以為從二里頭遺址延伸到盤龍城期間都是二里頭國家的範圍，但是實際上二里頭國家到盤龍城之間，所能控制的，也許只有路線，並非面的控制。同樣的方法運用到二里崗期，我們發現所謂第二級聚落只有偃師商城，有學者認為偃師商城的設置，也許與鎮壓二里頭國家的遺民有關，也應當視為一種例外。如果將此一例外暫時排除，我們發現在二里崗期的國家，其聚落層級縮減為三級，但是其文化影響範圍反而擴大。最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崗時期的鄭州商城遺址廣達 2,500 公頃，與其他聚落尺度的反差變大，這可能顯示二里頭國家與二里岡國家的性質有重大的差異。此種首大聚落與其他聚落的高度反差，在晚商時代更顯得突出，安陽殷墟遺址廣達 3,600 公頃(是二里頭遺址的 12 倍)，但被認為是區域性控制中心的濟南大辛莊卻僅有 30 公頃。從已經進行過系統區域調查的安陽洹河流域觀察，除了安陽殷墟以外，都是小於 10 公頃的村落，更重要的是殷墟是附近唯一出土青銅器的遺址。⁷⁰小清河流域大辛莊狀況也相同。⁷¹二里崗期伊洛河流域也僅有偃師商城獨大。

由此看來，政治力量似乎已介入了聚落的空間分布，核心聚落中的政治體，利用政治力將所有資源吸收到核心聚落，讓其餘聚落維持在村落的等級，形成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反差，以利控制。此一現象顯示，以上利用「中地理論」的「市場原則」，或「交通原則」來看商代國家是有問題的。換言之，商代國家的空間分布，不同於經濟學的原則，而必須尋求政治性的解釋。也許中地理論的「行政原則」可為參考。

程——伊洛河地區的聚落形態研究》，頁 161-218。

7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隊，〈洹河流域區域考古初步研究報告〉，頁 13-22。

71 方輝等，〈濟南市小清河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頁 330-352。

五、綜合論述模型

在聚落考古學的理論上，張光直與採取純粹的空間理論的考古學者不同，他所關心的不只是空間的或經濟上的關係，還關注聚落間的宗教、政治與社會網絡等面向的有機連繫，是一種「綜合論述模型」。⁷²他曾經在一篇〈中國考古學上的聚落形態——一個青銅時代的例子〉展示春秋時代城邑不同面向的關係，包括這些城邑的姓，也就是種族，以及政治隸屬的時代變化等，展現了同樣的聚落分布模式，在不同時期政治的隸屬會有相當大的變化。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以春秋時代例子，說明空間或位置考古學無法提供考古學上聚落形態作為人類學的解釋一個充分的模式。但是，這篇文章本身相當簡短，說明了空間考古的不足，卻無法讓人瞭解他的操作方式。

比較完整地展現張光直想法的，可能是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一書，他企圖根據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歸納出夏、商、周三代政治權威的來源，以及其興起的過程。這是第一本以現代的人類學觀點，從當時的藝術、神話與禮儀出發，重新詮釋與綜合古代政治的書籍。書的篇幅雖小，而且是作為大學部的課本，寫得十分簡單，但是筆者認為它對上古史的貢獻卻相當大。書中的章節包括：(1)宗族、城邑與政治地景，(2)道德權威與妥協的力量，(3)薩滿教與政治，(4)藝術作為政治的工具，(5)書寫作為政治的工具，(6)工具的取得，(7)政治權威的興起過程。這些章節的標題已將他的基本概念展現出來，他認為道德、軍事、薩滿教、藝術、文字在三代都是政治權威的來源，或其表達權威的工具；這些東西的整體表現，就是

⁷² Kwang-chih Chang,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rchaeology*.

宗族與城邑模式等所展現出的政治地景，這是相當重要的整合。⁷³

不過，這本書的問題，除了內容簡略之外，主要有二：首先，他認為夏、商、周雖然是三個不同的宗族，但是在政治文化上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夏、商、周在社會結構、政治體制與宗教觀念上有根本的差別。從殷到周的轉化，宏觀而言，商代以政治為主，控制宗教再掌握經濟的模式。西周則將宗教切分為儀式、教育與道德教化與下層信仰三段，強調教育與道德教化的部份。這種轉變具有「現代性」，從世界史的角度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變化，不能以一脈相承視之。更不用說從二里頭文化到早商文化之間，政治形態與控制能力可能也是一種質變而非量變。其次，張光直是從工具的角度看政治權威的來源，包括藝術、宗教、文字等，但是筆者認為藝術、宗教、文字都不只是工具，而是一個整體的政治文化的一部份。

同樣採取綜合論述模型的還有崔格爾(Bruce Trigger)，他所提出跨文明的比較框架包括社會組織、經濟與認知和象徵性三大方面，每個方面再分門別類：(A)社會組織，包括：(1)王位，(2)國家：城市國家與領域國家，(3)都市化，(4)等級制度以及社會流動性，(5)家庭組織以及性別角色，(6)行政，(7)法律，(8)軍隊組織。(B)經濟：(1)糧食生產，(2)土地所有，(3)貿易與工藝專業化，(4)財富的分配。(C)認知與象徵性的面向：(1)超自然的觀念，(2)宇宙觀以及宇宙生成論，(3)祭儀，(4)祭司、祭典與超自然的政治現象，(5)個人以及宇宙，(6)菁英的藝術與建築，(7)識字以及專門知識，(8)價值與個人的抱負。這無疑是

⁷³ Kwang-chih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張光直這本書是將他在哈佛大學授課的材料改寫成的，所以是綜合性的，論證比較簡單，但是主題清楚，系統井然。

一個完整的古代文明比較的表單。⁷⁴

關於商代文明方面崔格爾雖然只能使用西方語言中討論商代有限的二手材料進行分析，但是他的討論展現出比較的方法，如何直接貫穿問題的核心。他的論題是「晚商政體究竟是城邦、小型領域國家或大型『領域國家』？」⁷⁵利用已知的古文明中城邦與領域國家的差異，他提出了以下幾項標準，推論商文明為大型「領域國家」：

第一，國君的稱謂：在其他文明所見的國君名稱，如果是城邦制，則會有許多國君都是使用相同的稱謂，而且在自稱與他稱都會有此種現象。但是商代國君自稱王，稱其他的政體的國君為侯、伯，說明商王朝的國君與這些侯、伯國的國君，並不是站在同一水平之上。

第二，遷徙以及國都的數目：城邦制中一個城邦，往往固定於同一地點，而且城邦的居民，往往有很強的向心力，能在政治的挫敗中，最終回歸原有的制度。但是大的領域國家往往有不只一個都城，而且會不時因為政治狀況而遷移首都。商王朝符合後者的狀況。

第三，國君移動模式：在大型領域國家，國君往往在國內不同地域移動，進行田獵、視察、收稅或進行各類宗教儀式。商王的移動模式，正與此相仿。

⁷⁴ Bruce G. Trigger,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⁷⁵ 領域國家(territorial states)，根據崔格爾的定義：「一個具有單一領袖的政治實體，以具有層級性的省級與地區的行政官員與行政中心來控制一個尺度相當大的區域，都會中心通常較小而且多半是行政官員、精英專家以及家臣，相對地農民則散佈在農場或村落。領域國家通常具有清楚的兩段式的經濟：農民利用農閒，以在地材料製造所有生活所需，並且在農民間交換所需。精英工匠居住在城市或貴族的地產內，以舶來的或貴重的材料，生產貴重物品專供王或上層階級使用。都會區的糧食基本上是由附近農村社區徵集來的，作為繳交給國家的稅或租金。」參見 Bruce G. Trigger,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pp. 1-14.

第四，聚落模式：早期文明的城邦往往是住宅與公共建築群聚在一起，並且外圍以城牆。大型領域國家的首都往往沒有城牆，但是公共建築與菁英份子的大型住宅，則往往圍以城牆或壕溝，以確保私密與安全。晚商的首都安陽，亦符合此一模式。

第五，農業經營模式：城邦制由於相鄰城邦彼此競爭，甚至征戰。因此，必須在都會區集中大量人口，也因而發展出比較密集的農業。相對地，大型的領域國家，往往會將過度集中的人口，移居到人口較少的地帶，以利整體的控制，農耕的方式較為粗放。商王朝主要仍舊依賴雨水，並未有灌溉系統，大體上也傾向大型領域國家。

第六，菁英青銅工業：在城邦制中，高級產品的生產，往往是針對一般市場，但在領域國家中，高級產品的生產，則往往針對王室及少數高級官員。商王朝的青銅器市場，也接近後者。

崔格爾此一研究的意義，不僅在於認定商王朝為大型領域國家，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判別城邦與領域國家的一般性方法。⁷⁶筆者大體贊同他的方法；不過，他無法研讀中文一手資料，僅依賴西文二手資料，因此在許多細節內容上已經過時，這當然會影到針對局部問題的推理以及最後的結論，對於熟悉材料者，也缺乏說服力。

六、未來的研究展望

筆者之所以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寫一篇研究討論，當然希望在此一課題上能有所作為。此一論題之所以有必要再進行研究，有幾個原因，其中之一是因為筆者覺得晚商時期的考古工作在過去二十年積累

⁷⁶ Bruce G. Trigger, "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pp. 43-62.

迅速，但是大多數學者在討論這些課題時，事實上都只用到很小的一部份材料，而且也還在前述幾種概念框架下進行論辯。認為商代是一個城邦或方國聯盟的學者，應當不會想到山東半島的晚商文化遺址點超過 1,500 個，而且在中國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之後，還可能略有增加(附圖二)。⁷⁷然而，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晚商時期才出現並且取代土著文化的，所以，這些商文化遺址的居民，多是此一地區的新移民。這些遺址中大約有五分之一以上，分布在距離渤海灣 20-50 公里的沿海地帶，而且被近來考古發掘證明是由商王朝所控制的製鹽遺址。由海邊起算，可以進一步區分為第一線的製鹽作坊，第二線的鹽工家屬居地與後勤補給，第三線貴族居住的控制聚落(附圖三)。再藉由地理空間分析，我們也大致瞭解某些聚落，例如濟南大辛莊等，與「鹽路」——即將鹽從產地運送至殷墟的路線控制有關。⁷⁸

山東北部渤海灣鹽業的興起，與河東鹽池的暫時性衰頹有密切的關係，如同前述，晚商時期的晉南地區，在二里頭時代與二里岡時代曾經因為是華北最主要鹽場——河東鹽池的開採而有很大的發展，但在晚商時期此一地帶卻近乎真空，如果不是無人之地，就是在考古的方法或視角上有缺憾，無法看到某些遺址。無論如何，晚商時期的晉南是商王朝無法進入的地帶，也就代表商王朝必須在其他地方找尋生活所必須的鹽。所以，從新的考古資料，我們知道商王朝在山東大量

77 黃銘崇等，〈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其意義——以山東地區為例〉。

78 關於山東地區的鹽業考古，近年有驚人的發展，可參見以下論文：李水城等，〈萊州灣地區古代鹽業考古調查〉，頁 82-91；方輝，〈商周時期魯北地區海鹽業的考古學研究〉，頁 53-67、〈商王朝東方經略的考古學觀察〉，頁 70-84。燕生東，〈山東陽信李屋商代遺存考古發掘及其意義〉，頁 9-15。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壽光市雙王城鹽業遺址 2008 年的發掘〉頁 18-36；王守功、李水城，〈山東壽光雙王城水庫製鹽業遺址〉，頁 72-77。

移民，也知道他們殖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為了取得生活必須的資源一鹽，並確保路線的安全。

透過比較詳細的考古資料，我們也得知晚商聚落的等級不完全與聚落尺度有關，而是與一個聚落是否居住著帶有青銅器與其他貴重財貨的商貴族，以松丸道雄所說的族邑與屬邑的來說，就是兩者的差別不在於尺度，而在於是否有貴族駐紮，有則是某族邑，無則是眾人所居的屬邑。同時也知道商式陶器經常與土著陶器並存，也就是說被征服的土著，有部份可能與移民的商人居住在上一聚落。陶器中土著式的比例，愈往東方愈重。膠東半島則完全是土著的天下。我們也看到商王朝身分等級相當高的貴族，至少出現在益都蘇埠屯以及滕州前掌大，身分中等的貴族出現在壽光益都侯城以及費縣(傳)，身分為低階偏高的貴族出現在濱州蘭家、蒼山東高堯等地，他們都帶有族徽、使用日名(甲、乙、丙、丁……)，也都遵守商王朝以爵、觚的套數作為身分等級的制度。以上對於山東地區的考古觀察，我們看到商王朝的一個角落，它究竟符合了以上那個模型？其實，它所展現的資料之豐富，足以讓我們以更複雜的綜合論述模型來進行研究。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們也希望不僅作為一個考古資料的消費者，還希望我們對於未來的考古方向有所提示。同樣以山東地區為例，《左傳·昭公十一年》：「紂克東夷而殞其身」，⁷⁹在傳世文獻記載中，山東地區的土著對於商王朝的移民有不小的抗拒。這項材料在晚商甲骨文與金文中，也有不少記載。我們知道，晚商的末代統治者帝辛的時代，至少與東夷(夷方)有兩次戰爭，規模相當大，其中一次商王親自出馬，時間幾乎長達一年。⁸⁰從前掌大出土的金文，我們也

7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323。

80 征夷方的研究相當多，而且同一學者經常有反覆的意見，以下以李學勤的

知道夷方並非統一的政體，他們可能分成幾個集團，首領被商王朝稱為「某伯」。能夠給商王朝帶來如此大的麻煩，這些夷人的遺物、遺跡按理說應當也相當豐富。目前學者大多以與晚商同時，主要分布於膠東半島的珍珠門文化當作夷人文化。但是，珍珠門文化遺址的數量並不多，即使在新的文物普查中，由於有意識的尋找，發現較多珍珠門文化遺址，但是整體而言，看似微弱的珍珠門文化竟然可以撼動商王朝是不易理解的。前面提到，有許多商移民的聚落，同時也出現了土著式的陶器，也許商王朝在山東地區的現實是「敵人就在你身邊」，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居住在同一聚落。這些被征服者在文化上、政治組織上與商王朝不同，一旦商王朝控制力量出現弱化現象，他們就再度群聚，群起抵抗。如果，以上的假設是可以接受的，那麼未來考古學家應當做的可能是仔細解剖某些聚落，例如山東桓台史家，考察商式與土著式文化在聚落內的分布。同時在文物普查或較大區域的調查時，也應當注意這種商、土混合聚落所佔的比例。

此外，史密斯的 *Political Landscape: Constellations of Authority in Early Complex Politics* 一書，在更細緻的研究操作上，曾經提出了地緣政治(geopolitics)、政體(politics)、政權(regimes)、機構(institutions)四個層次的概念作為研究政體的模式。這四個層次，範圍由大到小，層層相屬，有其系統性，其目的是為了群聚與跨文明的比較。他指出過去相關研究專注的是跨文化的同質性，他的研究，作為一個屬於人類學傳統的跨文明比較，注意的則是其差異性。⁸¹

說法為例。見李學勤，〈帝辛十祀征人方的路程〉，頁 37-60；〈重論夷方〉，頁 331-336；〈論新出現的一片征人方卜辭〉，頁 1-3；〈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頁 3-7。李學勤，〈帝辛征夷方卜辭的擴大〉，頁 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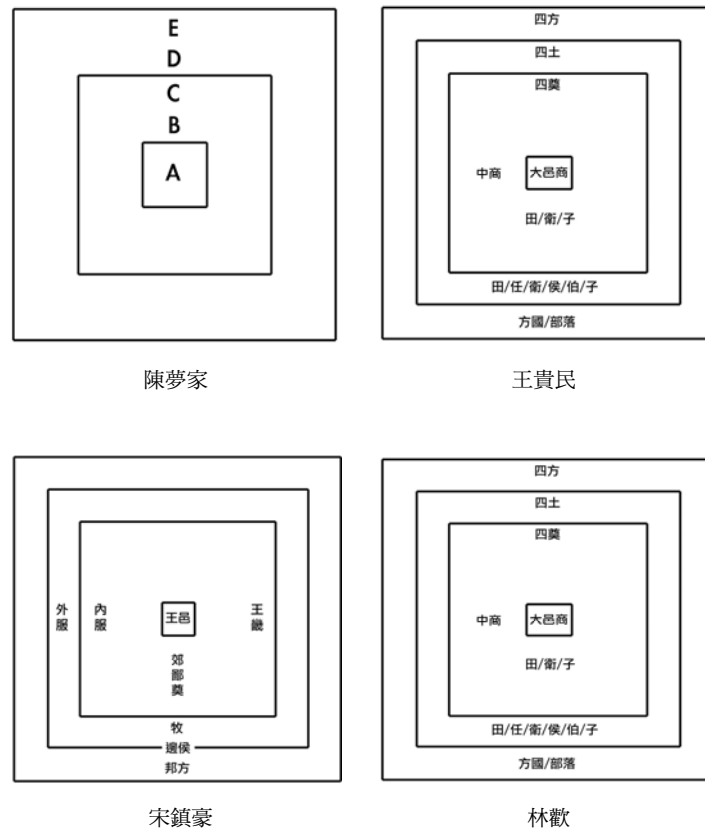
⁸¹ Adam T. Smith,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Constellations of Authority in Early Complex Politics*.

由於筆者目前的研究對象為晚商文化，史密斯的框架可以提供參考，但因為材料侷限，無法照單全收。前述張光直以及崔格爾的框架提供重要的啟發：首先，晚商的政治，無法單獨地由傳世文獻、古文字、美術史或考古學建構起來，而是一門綜合的藝術，這一點是張光直所強調的。其次，商王朝的政治地景不是純粹的「政治的」問題，它不僅要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亦即政治、社會的問題；也要處理人使用資源或人與自然的關係，亦即經濟或生態問題；同時也要處理人的內在地景(inner landscape)，亦即宗教與意識形態的問題，這是崔格爾架構的基本精神。最後，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過程，並不是單線的「演化」(從一個階段進化到另一個階段)的過程，氣候與環境條件的改變，黃河下游的遷徙等自然因素，透過草原而來的外來文化的刺激，以及人群因應自然與社會的改變，所形成的特殊社會結構，嚴重挑戰單線演化軌跡的思考模式。總而言之，這些新出材料的面向相當廣闊，採取綜合論述模型並做適當調整，會有很大的發揮空間，筆者將在〈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一文進行詳細論證。

(本文於 2011 年 4 月 26 日收稿；2011 年 9 月 7 日通過刊登)

*本文承兩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以及貴刊編委會的指正與細心校理，特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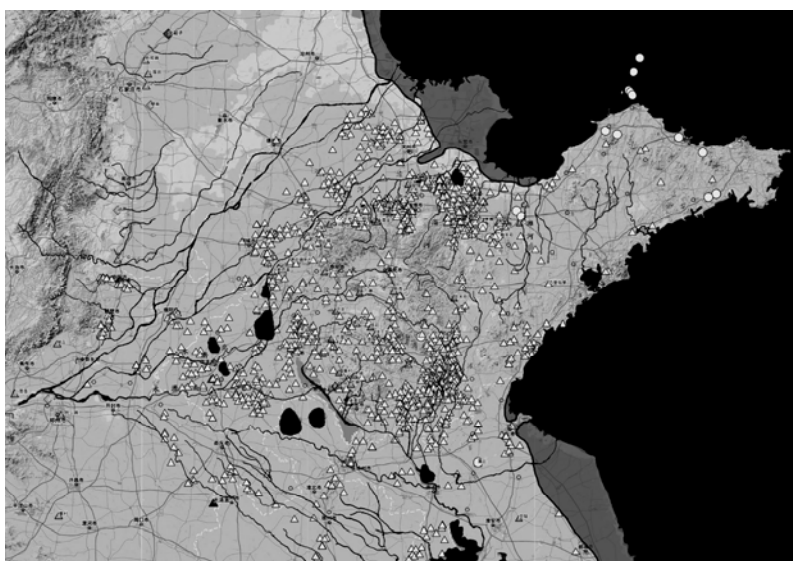
圖一 不同學者的商王朝政治區域模型(方格中之方格模型)圖示



資料來源：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王貴民，〈商周政權結構〉、宋鎮豪，〈論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構〉、林歡，〈晚商地理論綱〉。經筆者重製而成。

圖版說明：關於陳夢家之圖示，依卜辭所見，A為商、大邑，B為奠，C為四土、四方，D為四戈，E為四方、多方、邦方。依西周所述，A為商邑、天邑商，D為殷國、殷邦、大邦殷，E為四方、多方、大小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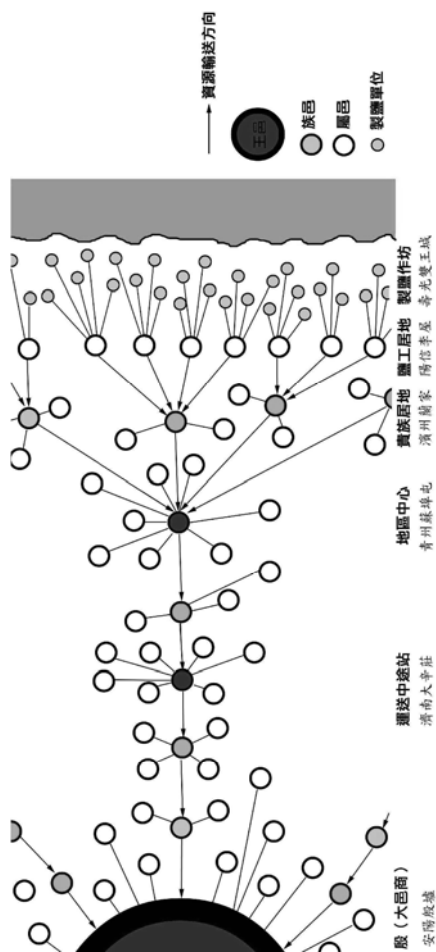
圖二 晚商時期山東地區遺址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商王朝地理資訊系統套疊晚商時期的河流、湖沼系統復原圖，出自黃銘崇等，〈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其意義——以山東地區為例〉，注意河北、河南大部份資料尚未輸入。

圖版說明：商文化遺址點超過一千五百個(三角形)，還有膠東半島的珍珠門文化(圓形)。青州蘇埠屯遺址與滕州前掌大遺址可能有最高等級(十爵、觚)的商貴族駐守，其餘商王朝重要貴族駐守地點包括壽光益都侯城、費縣、蒼山東高堯、濱州蘭家、惠民大郭、濟南大辛莊等。

圖三 從渤海灣製鹽作坊到殷墟間各種聚落的分工、類型與等級



資料來源：黃銘崇等，〈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其意義——以山東地區為例〉。

圖版說明：顏色深淺代表等級高低。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逸周書》，臺北：中華書局，1980。
- 《戰國策》，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 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孫詒讓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 于省吾，〈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社會性質〉，《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2&3(長春，1957)，頁 97-13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洛陽盆地 2001-2003 年考古調查簡報〉，《考古》，5(北京，2005)，頁 18-37。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中美
洹河流域考古隊，〈洹河流域區域考古初步研究報告〉，《考古》，10(北京，1998)，頁 13-22。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3。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華書局，1980-1983。
-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壽光市文化局，〈山東壽光市雙王城鹽業遺址 2008 年的發掘〉，《考古》，3(北京，2010)，頁 18-36。
- 王守功、李水城，〈山東壽光雙王城水庫製鹽業遺址〉，《2008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72-77。
-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451-480。
- 王貴民，〈商周政權結構〉，《商周制度考信》，臺北：明文書局，1989，頁 95-169。
- 王震中，〈商代的王畿與四土〉，《殷都學刊》，4(安陽，2007)，頁 1-13。
- 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結構與商王的統治方式〉，《中國社會科學》，4(北京，2007)，頁 184-208。
- 方輝，〈商周時期魯北地區海鹽業的考古學研究〉，《考古》，4(北京，2004)，頁 53-67。
- 方輝，〈商王朝東方經略的考古學觀察〉，《多維視域——商王朝與中原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70-84。
- 方輝等，〈濟南市小清河流域區域系統考古調查〉，《東方考古》，2(濟南，2005)，頁 330-352。
- 貝塚茂樹，〈中國古代都市國家の性格〉，收入《世界考古學大系》，第 6 冊，《東アジア II》，東京：平凡社，1958，頁 162-167。
- 貝塚茂樹，《中國の古代國家》，收入《貝塚茂樹著作集》，第 1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頁 49-100。
- 杜正勝，《周代城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 杜正勝，〈卜辭中所見的城邦形態〉，收入吳榮曾主編，《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2-34。
- 宋新潮，《殷商文化區域研究》，北京：中國古籍出版社，1988。
- 宋鎮豪，〈論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1(北京，2001)，頁 6-27。
- 宋鎮豪，〈商代的王畿、四土與四至〉，《南方文物》，1(南昌，1994)，頁 55-59、48。
- 宋鎮豪，〈商代的邑制所反應的社會性質〉，《中國史研究》，4(北京，1994)，頁 57-65。
- 宋鎮豪，〈商代「邑」區劃形態考察〉，收入黃明蘭等主編，《河洛文明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 190-215。
- 李水城、蘭玉富、王輝、胡明明，〈萊州灣地區古代鹽業考古調查〉，《鹽業史研究》，1(自貢，2003)，頁 82-91。
- 李雪山，〈商後期王畿行政區劃研究〉，《鄭州大學學報》，34：2(鄭州，2001)，頁 99-105。
-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Sarah Allan)，《英國所藏甲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1992。
- 李學勤，〈重論夷方〉，《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頁 331-336。
- 李學勤，〈論新出現的一片征人方卜辭〉，《殷都學刊》，1(安陽，2005)，頁 1-3。
- 李學勤，〈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中國史研究》，4(北京，2006)，頁 3-7。

- 李學勤，〈帝辛征夷方卜辭的擴大〉，《中國史研究》，1(北京，2008)，頁 15-20。
- 呂智榮，〈試論陝晉北部黃河兩岸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及有關問題〉，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214-225。
- 林澐，〈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6(北京，1981)，頁 67-92。
- 林歡，《晚商地理論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
- 松丸道雄，〈殷墟卜辭中の田獵地について——殷代國家構造研究のため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31(東京，1963)，頁 1-163。
- 松丸道雄，〈殷周國家の構造〉，收入《岩波講座・世界歴史》，第 4 冊，《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70，頁 49-100。
- 松丸道雄，〈殷の國家〉，收入松丸道雄、永田英正著，《中國文明の成立》，東京：講談社，1985，頁 57-66。
- 松丸道雄，〈殷周春秋史總說〉，收於氏編，《殷周秦漢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2001，頁 3-26。
-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宮崎市定，〈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說〉，《歴史と地理》，32：3(京都，1933)，頁 187-200。
- 宮崎市定，〈中國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國家か〉，《史林》，32：2(京都，1950)，頁 1-20。
- 晁福林，〈從方國聯盟的發展看殷都屢遷的原因〉，《北京師範大學

- 學報》，1(北京，1985)，頁 65-73。
- 徐義華，〈商代國家性質申論〉，《殷都學刊》，1(安陽，2007)，頁 8-17。
-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78。
- 陳星燦、劉莉、李潤權、華瀚維、艾琳，〈中國文明腹地的社會複雜化進程——伊洛河地區的聚落形態研究〉，《考古學報》，2(北京，2003)，頁 161-218。
-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 陳煒湛，《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
- 張光直，〈說殷代的「亞形」〉，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81-86。
- 張亞初，〈殷墟都城與山西方國考略〉，《古文字研究》，10(北京，1983)，頁 388-404。
- 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李家崖古城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西安，1988)，頁 47-56。
- 黃俊傑，〈古代希臘城邦研究的主要趨勢及其方法上的問題——兼論古代中國與希臘城邦比較研究的若干方向〉，收入氏著，《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臺北：學生書局，1977，頁 1-80。
- 黃銘崇，〈明堂與中國上古之宇宙觀〉，《城市與設計》，4(臺北，1998)，頁 134-195。
- 黃銘崇，〈晚商王朝的政治地景〉，收入《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待刊。
- 黃銘崇、黃一凡、林焜翰、林農堯，〈晚商文化的分布及其意義——以山東地區為例〉，收入《東亞考古學的再思——張光直先生逝世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待刊。
- 連劭名，〈殷墟卜辭所見商代的王畿〉，《考古與文物》，5(西安，

- 1995), 頁 38-66。
- 連劭名, 〈殷墟卜辭中的戌和奠〉, 《殷都學刊》, 2(安陽, 1997), 頁 1-6。
- 裘錫圭, 〈說殷墟卜辭中的「奠」——討論商人處置服屬者的一種方法〉,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4: 3(臺北, 1993), 頁 659-686。
- 楊升南, 〈卜辭中所見諸侯隊商王室的臣屬關係〉, 收入氏著, 《甲骨文商史叢考》, 北京: 線裝書局, 2007, 頁 15-52。
- 楊升南, 〈殷墟甲骨文中的邑和族〉, 收入氏著, 《甲骨文商史叢考》, 北京: 線裝書局, 2007, 頁 152-166。
- 董作賓, 《殷曆譜》, 四川南溪李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45。
- 燕生東, 〈山東陽信李屋商代遺存考古發掘及其意義〉, 《古代文明研究通訊》, 20(北京, 2004), 頁 9-15。
- 鍾柏生, 《殷商卜辭地理論叢》,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89。
- 鍾柏生, 〈記事刻辭中的殷代地名〉, 《漢學研究》, 7: 1(臺北, 1989.3), 頁 61-129。
- 鍾柏生, 〈卜辭所見芻牧地名〉,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50(臺北, 1995), 頁 163-184。
- 鄭杰祥, 《殷代地理概論》, 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 劉莉、陳星燦, 〈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 《東南文化》, 3(南京, 2000), 頁 45-60。
- 蕭良瓊, 〈商代的都邑邦鄙〉, 收入《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安陽: 《殷都學刊》增刊, 1985, 頁 337-349。
- Adams, Robert McC. and Hans, J. Nissen. *The Uruk Countryside: the*

- Natural Settings of Urb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 Allan, Sarah.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 Carneiro, Robert L. "Chieftdom: Precursor of State," in Jones, G. D. and Kautz, R. R. eds.,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7-75.
- Chang, Kwang-chih.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harlton, Thomas H. and Deborah, L. Nichols. "The City-State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in Deborah, L. Nichols and Charlton, Thomas H. eds.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p. 1-14.
- Johnson, G. A. "A Test of the Utility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in Archaeology," in Ucko, P., Tringham, R., and Dimbleby, G. eds.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 769-785.
- Johnson, G. A. *Local Exchange and Early State Development in Southwestern Ir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Keightley, David N.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Urban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93:4(December, 1973), pp. 527-538.
- Keightley, David N. "The Origi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A Comment," *Early China*, 1(1975), pp. 63-65.
- Keightley, David N. "The Religious Commitment: Shang Theology and the Gene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History of Religions*,

- 17:3&4(1978), pp. 211-225.
- Keightley, David N.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Early China*, 5(1980), pp. 25-34.
- Keightley, David N. "The Late Shang State: Where, When and What," in Keightley David. N. e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523-564.
- Keightley, David N. *The Ancestral Landscape: Time, Space 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 (ca.1200-1045 B.C.)*,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C Berkeley, 2000, p. 56.
- Li, Feng. "Reconceptualizing the Western Zhou State: Reflections on Previous Theories and Models," in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1-299. 中譯：李峰著、彭小軍、吳敏娜譯，〈重新認識西周國家——對早先理論和模式的反思〉，《三代考古》，3(北京，2009)，頁 124-149。
-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2003.
- Liu, Li.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iu, Li and Chen, Xingcan. "Cities and Towns: the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arly States,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3(2001), pp. 5-48.
- Lloyd, Peter E., and Dicken, Peter. *Location in Space: 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 Ge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2nd edition, pp. 20-66.
- Maisels, Charles Keith.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From Hunting and*

- gathering to Agri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0.
- Morris, Ian. "An Archaeology of Equalities? The Greek City-Stat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pp. 91-106.
- Small, David. "City-States Dynamics through a Greek Lens," in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pp. 107-118.
- Smith, Adam T.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Constellations of Authority in Early Complex Poli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 30-111.
- Southall, Aidan William. *Alur Society: A Study in Processes and Types of Domination*, Cambridge: W. Heffer, 1956.
- Southall, Aidan William. "The Segmentary State in Africa and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1(1988), pp. 52-82.
- Stone, Elizabeth. "City-States and Their Centers: the Mesopotamian Exampl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pp. 15-26.
- Tambiah, Stanley Jeyaraja.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Cultural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52-286.
- Trigger, Bruce. "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1(1999), pp. 43-62.
- Trigger, Bruce G.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Vandermeersch, L. "Review of *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T'oung Pao*, 59(Leiden, 1973), pp. 254-262.
- Wheatley, Paul. *The Pivot of Four Quarters: A Preliminary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t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71.

Yates, Robin. "The City-Stat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Archaeology of City-States: 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edited by Deborah Noicols and Thomas Charlto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7, pp. 71-90.

Yoffee, Norman.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orphology of Late Shang Politics: An Investigation on Spatial Models

Ming-chung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odels of Shang dynasty political space developed by modern scholars. These models include: (1) the traditional model—a box within a box; (2) the union of regional states and city states model; (3) the settlement system state and gruyère model; (4) the spatial archaeology model; and (5) the synthesis model. These models have all appear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ir own individual academic contexts and are all problematic in their own way. Based on late Shang dynasty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excavate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readily apparent that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models listed above differ (to a greater or lesser extent) from the phenomena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he large amount of recently excav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an allow us to use a complex synthesis model to discuss the Shang, but, because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past has been overly simplistic, utilized out-of-date materials, or used only second-hand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s, there is still great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of research.

Keywords: late Shang dynasty, box within a box, union of regional states, city states, settlement system state, gruyere model, spatial archaeology models, synthesis model